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4.866

## “美丽的新世界”萌芽：《我城》的乌托邦书写研究

初瑛竺<sup>1</sup>

(<sup>1</sup>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我城》不仅标志着西西香港意识的萌发，也构成其乌托邦书写的开端。西西在《我城》中构筑出具有独特思想内涵的“香港乌托邦”图景，其核心可从人与城市、人与自然以及时间维度三重关系加以理解。这一乌托邦构想不仅展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也折射出彼时香港社会的复杂处境与身份认同问题。一方面，乌托邦书写体现出作者对当时香港社会现状的不满与批判；另一方面，则承载着对未来社会结构与多重关系的积极展望与美好愿景。在理想与现实的交错之中，乌托邦不仅成为西西批判现实的镜像空间，也成为想象未来共同体的精神寄托，展现出西西对香港现实及其未来可能性的深切关怀与思考。

**关键词：**西西；《我城》；乌托邦；香港

在香港文学史中，西西的《我城》无疑是一部如地基一般的经典名作。《我城》于 1975 年开始在《快报》连载，1979 年发行第一版单行本<sup>[2]</sup>。此前其文本解读和研究方向多种多样，此后也将随着读者和研究者不断地阅读和挖掘，生发无限阐释的可能。在之前的研究中，学者们对《我城》的探讨大多聚焦于城市书写、本土意识、童话写实、跨媒介等方面，多是针对《我城》这本书的写作手法，较少联系到乌托邦这一文学讨论中的经典议题。而在少数关于《我城》与乌托邦的研究中，陈洁仪的《西西〈我城〉的科幻元素与现代性》<sup>[1]</sup>从地域空间视角探讨“我城”与恶托邦的关系；王蕴懿的《美丽的新世界：谈西西的乌托邦书写》<sup>[2]</sup>结合《我城》、《飞毡》和《我的乔治亚》三部作品，综合分析西西乌托邦书写的脉络，并认为其乌托邦书写进程呈现为内在统一的多重变奏。然而在上述两篇文章中，一篇以点带面，目光聚焦于科幻元素、现代性与恶托邦；一篇则是主要关注《我的乔治亚》，对《我城》乌托邦书写的整体分析不够全面。然而，纵观西西的写作历程可以发现，《我城》不仅是西西香港意识的萌芽，更可以说是她乌托邦意识呈现的起点。西西的乌托邦意识为何从《我城》开始生发？其乌托邦书写又如何在本中得以初步呈现？诸如此类《我城》与乌托邦意识和书写的联结亟待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本文将“乌托邦书写”为基点，对《我城》进行深入解读，探索西西在《我城》中渗透的乌托邦意识，为研究西西的乌托邦书写做进一步扩展与补充，并进一步考察这一乌托邦书写如何映射出香港的身份认同问题与文化愿景。

### 一、乌托邦·我城·香港

乌托邦 (Utopia) 一词来源于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 (Thomas More) 于 1516 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在这本极富有创新性和想象力的作品中，莫尔借探险家拉斐尔·希斯拉德之口，描述了一个高度理想化的国度，即乌托邦。从构词层面上来看，“Utopia”囊括了希腊语的“ou” (表否定) 与“topos” (地域)，直译为“不存在的地方”；但同时，这个词又暗含“eu-topia” (美好之地) 的谐音双关，由此构成一语双指。因此，乌托邦既表示无处可寻的幻想之境 (不存在的地方)，又最终指向人类的完美社会追求 (美好之地)，具有批判现实与构建理想的双重属性。

“乌托邦的核心精神是批判，批判经验现实中不合理、反理性的东西，并提供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sup>[3]</sup>。纵览此前种种乌托邦形象可知，孕育乌托邦意识的一个必要条件是现实世界里有一个急需改进、令人不满的社会。例如，莫尔的乌托邦对彼时英国的社会阶级分化、资本主义的罪恶表示了不满；柏拉图笔下的乌托邦形象“理想国”对希腊社会的现实、政治和教育进行了批判；陶渊明的“桃花源”基于社会动荡、战乱频繁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香港文学中的‘香港书写’与岭南文化认同研究 (1985—2017) (21CZW047)”；本文获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香港文学中的饮食书写与岭南文化认同研究” (2025KYLX023) 资助。

**作者简介：**初瑛竺 (1998-)，女，山东烟台人，华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香港文学。

<sup>[2]</sup> 西西的《我城》单行版本共有四种，分别为素叶版、允晨版、素叶增订本、洪范版。本论文使用版本为承袭洪范版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内地版本。

的东晋而诞生,西西“我城”的现实基础——香港,也是如此。众所周知,香港的经济于20世纪70年代起飞,而《我城》反映的是正是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港督麦理浩于1971年上任之后,在任内推动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当中包括十年建屋计划、发展新市镇、扩展中学及高等教育、改善社会服务及设施、打击罪恶等”<sup>[4]</sup>。这些改革使香港社会面貌发生深刻转变,港人因此充满斗志与希望。经济发展带动身份认同的增强,香港逐步摆脱边缘地位,港人更多开始关注本土,并以身为香港人为荣。由此港人逐渐产生香港意识,香港作家开始进行“香港书写”<sup>[5]</sup>。此种对香港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是西西进行“香港书写”的动因之一,西西爱香港,也通过笔尖反映香港,因此“我城”意识和《我城》就此诞生。然而希望与忧虑并存,彼时的香港伴随经济发展也产生许多社会问题。面对石油危机、人口膨胀、淡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电力紧缺这些社会问题,西西借助阿发班主任之口表示了对当下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期待:“目前的世界不好。我们让你们到世界上来,没有为你们好好建造起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实在很惭愧……你们年轻,你们可以依你们的理想来创造美丽的新世界。”<sup>[6]</sup>值得注意的是,“美丽的新世界”来源于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经典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西西在书中有意且多次使用该词组,正是其乌托邦意识的一个明显表露。西西本人也在手稿中对乌托邦有这样的评价:“好像是心理学上的一个名词……我的体内就埋着那样的一粒种子,不时发芽抽叶,令我不安于室。”<sup>[7]</sup>实际上,无论是“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二者融洽地相交辉映于《我城》中,其动因都是源于一种“不妥协、要改善现实的精神”<sup>[8]</sup>。西西谈到《我城》的时候说过:“以往我写的是存在主义式的小说《东城故事》《象是笨蛋》《草图》等等,都相当灰色……这小说不同,看事物抱持另一种态度,开朗多了,收结也充满希望。出现了一个地图上没有的新大陆,大家可以搬到那里去。”<sup>[9]</sup>这个“地图上没有的新大陆”,不仅是西西在当时的香港环境下建设心灵家园和精神家园的乌托邦书写,也是她用来构建理想社会生活与和谐人际关系的载体,西西笔下营造出的“我城”正是她乃至无数港民心中的“香港乌托邦”。可以说,因为香港意识的生成,西西写出了关注香港的《我城》;又因为彼时香港社会存在许多问题,西西在表达不满的同时对香港的未来进行展望,以乌托邦的形式对“我城”进行虚幻建构,同时对现实社会的危机进行乌托邦式的解构与“童话”和“寓言”式重塑,其乌托邦书写于此得到初步展现,因此“《我城》可以说是西西乌托邦的构建”<sup>[10]</sup>。

## 二、“我城”中的人与城

纯洁高尚的人格、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以及稳固牢靠的社会结构一向是乌托邦社会的核心追求之一。当西西面对飞速发展的香港,感受到资本主义以一种迅猛的态势席卷香港并改变人与人之间的结构时,她的不安与担忧也随之而来。在《我城》的乌托邦构建中,她对众多个性迥异的角色进行塑造,使人物展现出一种趋向极致的人格崇高性。这些人物具备纯善、乐观等理想化品质,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为“我城”做出个人贡献以维护社会稳定。在近乎稳定和谐的社会背景下,人的本性逐渐被引导至完美状态,从而超越现实社会中的矛盾与冲突。因此,文本在人与人的关系之间构建出一种接近无暇的纯净状态,进而逐步建造与表现高度和谐的社会关系。通过对人本身、人际关系的乌托邦式的构想,西西展现了对“我城”这个美好社会的文学想象,实现对社会现实的理想化超越,同时蕴含对现实社会局限性的思考。

### (一) 至真至善:人的主体性与纯洁性塑造

扎米亚京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通过对个人集体化的描绘,试图消解个体的独立人格,削弱人物的个性特征,使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取而代之,吞噬个体存在。与此相反,西西将创作视角聚焦于平凡世界中的普通人。在希伯来先知者关于乌托邦的叙述中就已经开始注意到个人,此后乌托邦叙述注重对个人的主体性及美好品质的书写,“个人”因此成为乌托邦文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因素。通读文本可以发现,书中没有固定的主角或处于中心位置的主人公,即角色无主配之分,人人都是“我城”的主角。随着叙述人物的转变,叙述视角也是移动的,“每一个人物或场景的单元不啻一个固定的视点”<sup>[11]</sup>,这极大地突出了人物形象作为个体的主体性和存在价值。不仅如此,在主体性之上,还可窥见人物之间“内在的联系”。此种联系可以理解为是人物的聚合,是对香港年轻一代本土青年的整体形塑。这主要体现在“我”——阿果身上。阿果是《我城》中出现的第一个人物,也只有阿果是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其余叙述者在叙事口吻上则处处蕴含阿果的影子,与阿果具有相似性。如果说阿果是香港新生代青年的“点”,那么其余人物则是香港本土青年的“面”。所有人物既是自己本身,也是千千万万个香港“阿果”的缩影,即20世纪70、80年代香港新生代群体的代表性象征。正如何福仁所言:“《我城》的我,是小写的我……这个我,当然是主观的创造;是表现,而非再现。”<sup>[12]</sup>《我城》的众我作为群体中的一员,改善“我城”的环境,就必须改进自我,然后众志成城。“然而这样子的我,平凡里已见不平凡。所以书名《我城》,而不是《我们的城》”。<sup>[13]</sup>通过描写日常人物

的奉献,《我城》彰显了个人自由意志与主体性的价值,强调个体在社会中的独立性与自我决定的力量。

在这座城中,阿果、阿发、麦快乐、阿北、悠悠、阿游等人的工作与生活虽显平凡,却蕴含深刻的人文意涵:“如果说《我城》是有关某个时空的年轻人的小说,则这种形式,也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它体现了年轻人美好的素质:开放,乐观进取,不断发展,充满可能。”<sup>[14]</sup>他们皆秉持善良纯洁的品性,展现出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并以温和的视角关照“我城”,体现了对生活的坚定信念与美好追求。西西认为:“香港有许多这样的青年人,活泼、充满朝气,穿牛仔裤唱民歌,难得的是相当明白事理,有正义感,但这种正义感不会放在嘴边,对生活的要求很踏实,很朴素……我写他们,写他们的生活态度。不过,我可不想太突出其中任何一个,不要忘记,那是反英雄的时代。他们做的不过是卑微的工作:看守公园、修理电话,没有什么了不起,生活环境却困难重重,可都努力去做,而且做得快快乐乐。这小说是献给这些无名英雄的。”<sup>[15]</sup>当阿果谈到其职业规划时,邮差、清道夫、农夫、渔夫等平凡的“蓝领”职业都是志愿的一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其余人物也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为“我城”的发展贡献个人力量。根据“异化论”可知,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往往会伴随人性的异变。然而西西却反其道行之,在书中赋予人物纯洁高尚的人格和趋于极致的单纯和善良,这在麦快乐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例如,麦快乐帮助游客赶走黄蜂而自己的双手却被叮肿,牺牲两天的午餐费刊登失物招领广告,帮助阿果适应工作,自己多承担工作等等,都是其善良的体现。文本与现实对读见,这种描写实际上是西西对当时香港社会情境的情感投射,体现了她对现实中人性的思考和重构。西西以孩童视角和童话口吻描绘“我城”,塑造一群至真至善的人物形象,展现出一种乌托邦式的纯洁与崇高。这恰恰是对现实人性关系弊病的强烈反思与深刻批判,呈现了一种渴望回归真挚情感与人性关怀的理想状态。

## (二) 打破冷漠: 人际关系的反思与重构

西西在文本中多次表现出机械工业社会带来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情感的冷漠,这也是反乌托邦文学着重表现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间离状态。在第4节中,西西明确表示:“现在可是引力能的时代了,一切都变了许多,那么触目即是的人,那么繁琐的工作,想彼此了解多一点,实在很困难了。”<sup>[16]</sup>这体现她对图腾社会的人际关系的向往。在第10节中,则体现她对人际关系的进一步思考。西西塑造了一个被包裹的世界,这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隔阂。在这里的人与物都被包裹起来,失去与外界沟通的途径,“包裹是意味人们不相往来了”<sup>[17]</sup>。在整篇文字的叙述和渲染下,城市呈现出一种缺乏活力的状态,充斥着沉闷与萧条。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显得极为匮乏,社会关系趋于冷漠,体现出一种情感上的隔阂和人际关系的疏松。不过西西依然内置希望在其中——一个舞挥着一把剑朝周围刺割的人。西西并未对该人物有过多描述,其形象显得尤为模糊。因此,此人物具备某种程度的泛指性,亦可视为“任何人”的代表。西西将生机蕴藏在剑中,以第二人称的叙述将读者也带入包裹世界,并且试图将这把剑传递给“你”。“你”要选择继续留在包裹里,还是割破一个个城市的包裹?这既是她自己对于现实世界的反抗和不满,也期待着读者从故事中得到启发和收获,运用这把“剑”,和她一起积极割开包裹,构建美丽新世界。

乌托邦社会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就是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和谐,不过《我城》中塑造的人际关系并非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十分和谐融洽的状态,而是伴随一个态度转变的过程。在第6节中,麦快乐因打扮新潮,被社区居民误认为“不务正业”,并因此在赶电梯时被留在电梯里。尽管他竭力为自己解释,但仍未能打破刻板印象。随着时间推移,他开始慢慢搭电梯并主动打招呼,最终逐渐获得居民的接受。麦快乐作为香港新生青年的代表之一,与阿果有所不同,他的“牛仔裤”和“长头发”代表的是一种新潮思想。居民从一开始的不信任到逐渐接受,在此过程中有一个开放、包容和理解的态度贯穿始终,最终指向的是对人际关系的建构,以及多元社会价值体系的认可。西西通过麦快乐的经历,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际关系从冷漠疏离到和谐共处的转变,成功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病态人际关系的重塑与调整,实现了社会关系的再建构和人际关系的复归。

虽没有在一开始就呈现完美的人际关系,但西西对人与人之间温情的关注在《我城》中也有体现。同样是在第6节中,麦快乐对于公园门口的“黄人绿狗,不得入内”十分愤怒,于是自己写了一张“咖啡或茶,免费供应”的牌子替换,并表示将来的公园就会如此。这是对未来的展望:人与人之间没有歧视,而是一种平等温情的关系。人际关系的展望与重构作为西西乌托邦书写的关键组成部分,展现了一种充满生机的未来图景,成为构建理想社会的核心要素。它不仅是乌托邦人性表现的载体,更通过其内在的张力突破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隔阂,推动了社会关系的重塑与情感的复苏。西西“敏锐地遇见了全球化征象下的市区重建、经济转型所导致的‘有机社群解体’……她‘寄望于人际的沟通、文化的觉醒和多元开放’,从而建立互助信任和开放包容的有机社群。”<sup>[18]</sup>

### 三、人与自然——和谐与抗争

在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描绘占据重要地位。自然不再是人类征服的对象，而是共生共存的伙伴。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反映了人类对于理想生态秩序的追求：“只有实现了生态理想，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理想、道德理想、人格理想；反之，如果缺乏生态理想的引领和烛照，则不足以在社会发展、道德修养、人格建构等方面达到理想境界。”<sup>[19]</sup>由此可见，生态理想深嵌于乌托邦的社会结构中，为其稳定发展提供自然支持。在《我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和谐”与“抗争”两种互为张力的模式：一方面体现在对自然与事物的尊重与顺应，彰显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另一方面，也不乏人类在极端环境中对自然的抗衡与挣扎。正是在这种动态的关系中，构建出一种人与自然的深层互依关系，使自然既成为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也成为乌托邦叙事的内在支柱。

#### （一）尊重与顺应：万物有灵

“万物有灵论”（Animism）来自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该观点认为“自然界中遍布‘类人’的生命和意志”<sup>[20]</sup>，即万物皆有其内在的生命力与意识，具备独立的情感结构与认知方式，能够对外在世界作出反应。“万物有灵论”因应的是人类社会进入人类世以后遭遇的巨大生态危机。<sup>[21]</sup>香港的能源主要依赖进口。在20世纪70年代，一方面，国际石油危机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电力供应面临压力。另一方面，由于香港长期依赖火力发电，能源的使用不仅成本增加，而且环境污染问题也变得更加严重。<sup>[1]</sup>此外，香港的河流和地下水稀少，水资源匮乏，再加上人口激增，香港面临水资源紧缺的问题。所以，当西西建筑“我城”时，对万物几乎都赋予灵性，她以此种方式构建理想中的人与生态。“我城”里的房子是开朗活泼的，字词和存钱罐会肚子饿，电线杆也有触觉，巴士喜欢闹脾气，草会对人喊话，袜子也有愿望……所有事物在西西的笔下都拥有了自己的灵性，人与万物在这个城中和谐相处。在城市空间中，事物不仅具有自身的思想与个性，作为城市主体的人类亦展现出对城市万物的充分尊重。这种人与物之间的互为主体、彼此尊重的关系，构成了城市生态的一种和谐共生。例如阿果遇到浴缸会道午安，阿邮和大炮们打招呼，阿傻替大炮拍照等等。神性与灵性弥漫“我城”中，“人仅仅是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在大自然中只有与其他生命同样的、而非更高的地位”<sup>[22]</sup>。西西笔下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非是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一种基于平等与共生的互动结构。在这样的关系中，城市并非是人类意志的主观产物，而是由包括自然元素在内的多重主体共同参与构建的有机整体。正是这些富有生气与灵性的非“人”事物的参与，使城市空间呈现出更为丰富的生命力与内在和谐。西西通过赋予万物以灵性，展现出她丰富奇幻的想象力与对未来理想图景的积极建构。这种书写不仅体现了她对自然与人类共生状态的设想，表达了对理想生活和美好未来的向往，同时也构想出一个人与万物和谐共处的生态乌托邦。

#### （二）抗争与挣扎：不必担心

乌托邦文学在面对神秘莫测的自然界时，并非是一味地顺应与屈从，而是展现出人类主体对自然的回应与合理利用。随着科技进步与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人利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逐步改造自然、满足物质需求。然而，这种对自然的持续干预也带来了生态失衡与环境危机。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在经历经济飞跃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生态与环境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西西试图找到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法，使人与自然的互相依存关系找到新的突破方向和可能，进行生态乌托邦的美好构建。在此背景下，她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展开了深入反思，并在《我城》中予以艺术化呈现，同时表现其乐观心理。《我城》的第11节集中反映了生态问题，西西写“石油枯竭了”和“水库干涸了”等资源危机。她在构建生态乌托邦的时候，不反对人类对自然做合理范围内的改造，而且支持在不过分破坏生态环境的情况下，让人类拥有自己改善生活环境的权利。例如城中居民在风雨交加、电闪雷鸣的夜晚，用斧头砍闪电，抢集电光；利用各种容器储蓄水资源，使用各种方法储存能源。尽管文本中运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但这类带有夸张色彩的叙述策略，实则是西西在构建其生态乌托邦“我城”过程中的一种艺术性想象与有意为之的选择，旨在通过非现实化的表达强化其对理想生态秩序的构想与批判现实的力度。在虚幻与现实对应下，她同样表达了对世界的乐观态度：“对于这个世界，你是不必过分担心的”，“对于这个世界，你无须感到绝望”<sup>[23]</sup>。

在面对现实这些生态、资源、人口危机的时候，西西并没有采取逃避的态度，而是积极应对。她在文本中试图解决用电用水问题，让城中人生存得到保障，同时也显示了西西对于这座城的乐观期待和愿望：人们在面对能源危机的时候，没有放弃，而是同舟共济，共渡难关。文中借新闻评述员的视角叙述：他从

[1] 参考央视中文国际：《国家记忆·香港生命线》之《照耀明珠》。

来不曾见过别的城市发挥过类似的同舟共济精神，因此很是感动；同时，他忽然对人类、世界，重新充满信心。<sup>[24]</sup>在西西的笔下，城中的人类努力实现“对自然的适应、与自然的和解、与自然的交融”<sup>[25]</sup>。人类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调整自身的生产与生活方式，逐步实现与自然的协同共处，从而构建出一种和谐共生的理想生态图景。

#### 四、时间维度——向前看和向后看

《我城》的叙述缺乏明确的时间指向，没有呈现一个完整的时间递进结构。基于此，贺小力提出《我城》存在三重时间建构：凝固的时间，流动的时间，幻想的时间。这种划分方式认为文中时间是主观的，“时间的分层是通过共时的行为产生”<sup>[26]</sup>。然而，细细拆解小说中的叙述，可以发现文本中其实存在“隐形的时间”。西西并未直接给出准确的时间点，而是以意识为载体，以当下为依托，回溯过去，展望未来。保罗·蒂里希（Paul Tillich）认为，“每一种乌托邦都在过去之中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基础——既有向前看的乌托邦，同样也有向后看的乌托邦……被想象为未来理想的事物同时也被投射为过去的‘往昔时光’——或者被当成人们从中而来并企图复归到其中去的事物”<sup>[27]</sup>。这提醒我们，乌托邦不仅是对未来进行美好遐想的产物，同样也会从过去社会中提取理想元素进行建构。事实上，西西在《我城》中所呈现的时间意识体现为一种与主体意识紧密交织的内在时间结构。时间不再是线性、客观的背景，而是随意识的流动而变动，与现实的当下形成对应与交汇，展现出一种隐秘而深层的时间意识形态。换言之，西西呈现的是一种心理时间，而非现实中真正流逝的线性时间。这恰与奥古斯丁（Augustine）的时间观相似：过去在记忆里，现在在感知中，未来在期待中。<sup>[28]</sup>西西正是立足当下，通过向前看与向后看，进而是于无形的时间意识中蕴含乌托邦的建构。

##### （一）向前看的乌托邦——展望未来

“向前看的乌托邦”在时间维度上是基于现在向未来推进的，它所描述的是关于未来的愿景，这是一种展望性的文学想象。“未来意识与对‘新’的向往，是《我城》里最显而易见的痕迹”<sup>[29]</sup>。《我城》的开篇以阿果父亲的葬礼为始，这一事件不仅象征着父亲生命的终结，也标志着主人公阿果新生活的开启。随葬礼而来的搬家成为叙事的新起点，开启了阿果生活变化和个人成长的新历程，从而引出时间意识中的“新”。葬礼在文本中具有多重象征意义，它既是死亡的具体展现，也是时间更替的契机。在第9节中，西西通过对出殡场景的细致描写，深化了这一意识。她在章节结尾写道：“在这个城市里，每天总有这些那些，和我们默然道别，渐渐隐去。”<sup>[30]</sup>此处的“道别”寓意着过去的消逝与未来的开启。而在对死亡的描述里，西西更明确指出：“人是不生不灭的呵。你以为我死了之后，我就没有了么。什么地方没有我呢，我成为历史，我成为过去的经验，我是过去与未来的一道桥。”<sup>[31]</sup>死亡在此被赋予具有超越性的时间意义，其不再只是象征终点，而是成为沟通“过去”与“未来”的桥梁，体现出她鲜明的未来意识。此外，在第18节的收束部分，文本以连续5次“再见”结束。重复性的词语既构成了对“过去”的情感告别，也象征着城市与人物将持续向未来行进的开放性。文中对未来的准确书写出现在第4节和第5节中，西西在这两节中准确使用了表未来的词——将来，这是西西未来意识的显著表达。在第4节中，阿果作文的题目是“将来”，其围绕“将来”表明了自己的愿望，阿果希望将来可以拨电话到月球、土星、银河上，这种具有童真的愿望也暗含科技可能带来的乌托邦图景。电话作为70年代的新兴科技产物在《我城》中频繁出现，成为连接现实与未来的重要媒介与承载“我城”未来发展的叙事工具。在第5节中，阿发的愿望之一是“将来长大了要创造美丽新世界”<sup>[32]</sup>。“将来”作为明确的时间指示词，将叙述视角从现实抽离，投向具有开放性的未来。将来的“美丽新世界”显然承载着理想化的未来图景，表达了对社会整体进步的期许，使文本由当下的城市现实转向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场域。而西西的未来意识同样体现在对本土空间之外——外太空的遐想，她在文中多次将地球与宇宙联结，进行一种互动式的未来书写。书中的第1节搬家、第3节超级市场节目、第4节以“将来”为题写作文、第18节与陌生声音对话均可见外太空或宇宙的元素。特别是在第18节中，阿果与神秘声音的对话体现了西西对未来的美好遐想：人类会在新的星球上建立美丽的新世界。<sup>[33]</sup>这是对前文阿发愿望的回应，也是西西对未来的眺望与书写。通过对未来图景的持续想象，体现了西西在乌托邦建构中指向未来的时间意识。在这一过程中，乌托邦不再是抽象的理想，而是在对未来的展望中被具体而稳固地塑造为一种可能的现实。

##### （二）向后看的乌托邦——回溯过去

“向后看的乌托邦”在时间维度上是追溯式的，是对过去的一种怀念和复归。在《我城》的时间意识中，明显蕴含一种对以往的追寻。这种追寻并非单纯的怀旧，而是牵涉对身份意识和传统文化的深层探究。西西通过回溯性的记忆和叙述穿插，实质上是对自身及集体身份的持续探问与重构。陈洁仪认为这可以使用

拉丁美洲的“立根小说”概念来解释<sup>[34]</sup>，而笔者认为，这体现了西西的“寻根意识”。当香港在英国和中国的夹缝中生存之时，港人的身份认同呈现出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而随着香港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身份上的不安意识进一步加剧。在“现代‘入侵’之下，‘前现代’的美好早已失落，‘传统’成为乡愁的乌托邦”<sup>[35]</sup>。因此，西西将目光投向过去，意图在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中寻求身份的根源与定位。此种回溯式的身份建构体现出一种典型的“乡愁乌托邦”式想象，既是对“我城”的情感投射，也反映了在现实认同困境中的精神寄托与文化寻求。在《我城》中，“向后看”将香港与中国连接，成为“乌托邦香港”构建的重要支撑。西西在书中将家国意识贯穿，试图找到属于自己和港人的“根”。在文中，她笔触多次涉及对内地的描写，最为明显的“寻根意识”体现第12节与第17节对黄帝的两次书写上。她明确表示喜欢黄帝并愿意做黄帝的子孙，展现出一种重复性的追寻。黄帝是中华文明的始祖之一，在中华文化传统中具有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他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起源，承担着凝聚族群意识、构建文化认同的功能。两次书写黄帝不仅唤起港人对民族起源的追思，也显现出对自身文化归属与身份的思考。在《我城》中，黄帝成为联结历史与现实的纽带，从而揭示出西西在中西文化夹缝中对身份的复杂思索与持续追问。在只有城籍没有国籍的尴尬情况下，西西对做一个炎黄子孙依然有很强的执念。这不仅承载着她个人由内地迁居香港的独特经验，也映射她建构“家园<sup>[1]</sup>乌托邦”的文化设想。在第13节中，母亲通过记忆追问阿果看见了什么，最后引出了“天佑我城”这个蕴含着乐观精神的愿望。“天佑我城”来源于英国的国歌《天佑女皇》，西西在这里把“女皇”一词改成“我城”，试图打破殖民话语对本土的遮蔽，开启一种基于自身文化经验与主体意识的重新命名过程。在对过去的追溯中，通过“阿游记得”，西西再次将香港与中国联结：我们的国家在地图上是一片形状如海棠的叶子。<sup>[36]</sup>空间的轮廓、界限和地理往往被用来作为身份认同的论述工具。<sup>[37]</sup>阿游的记忆勾起对国家地图的想象，西西希冀从过去中展望未来，她从中而来并企图复归其中，构建属于自己的城。

## 结语

《我城》是“一本有关年青人在这个城市的故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本土意识萌芽的香港活现眼前，既描画美好一面，亦带有时代隐忧，整体是一片希望、朝气蓬勃，正立于发展起点的年青城市”<sup>[38]</sup>。香港这座城市在当时既充满忧虑，也孕育希望。正是基于强烈的爱港情怀与深切的忧患意识，西西创作了在香港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我城》。本文对《我城》的乌托邦意识与书写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从乌托邦与香港和“我城”的关系出发，分别讨论“我城”中人与城、人与自然、时间维度的关系。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西西在《我城》中并未构建一个完全脱离现实的梦幻乌托邦，而是通过扎根香港这片土地，进行富有创意的想象，勾画出一个“香港乌托邦”。“乌托邦对理想城市的想象始终伴随着现实城市，同时又与现实城市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既保持了对现实城市的批判性，又具有未来的指向性”<sup>[39]</sup>，西西在作品中通过文字塑造的“香港乌托邦”，突破了传统地域的限制，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边界。这一构想不仅体现了作者对香港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突出与批判了彼时香港存在的社会问题，也表现了其对香港未来发展的积极展望。《我城》在这种跨越时空的想象和现实结合中，呈现出一种动态的文化符号，使得文本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保持着其独特的文学价值和文化魅力。正如陈智德评价：“香港是一个充满行动的世界，顾不上理想。如西西这样，沉溺在醒着的梦里，无功无用，实在是这世界分出的一点心、走开的一点神。所以，西西其实是替香港做梦，给这个太过结实的地方添一些虚无的魅影。西西，她是香港的说梦人。”<sup>[40]</sup>此后西西也沿着她的乌托邦设想，进行了一系列有关“香港”的造梦，例如此后她在《浮城志异》中塑造的“河之第三岸”，再到《飞毡》中发出“乌托邦就在肥土镇”的感叹，其乌托邦构建也随之延续下去。

## 参考文献：

- [1][34]陈洁仪.西西<我城>的科幻元素与现代性[J].东华汉学,2008,(8):231-253.
- [2]王蕴懿.美丽的新世界：谈西西的乌托邦书写[J].华文文学,2023,(3):91-99.
- [3]尤尔根·哈贝马斯,米夏埃尔·哈勒.作为未来的过去——与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对话[M].章国锋 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22-123.
- [4]转引自刘智鹏,刘蜀永:香港史——从远古到九七[M].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9:378.原见中央文献编辑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500-501.
- [5]徐诗颖.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小说中的“香港书写”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4.
- [6][16][17][23][24][30][31][32][33][36]西西.我城[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60,49,131,141,140,126,1

<sup>[1]</sup>“家园”一词在汉语中原本是对出生和栖居之地的经验性表达，它寓意着熟识、亲近、眷恋、舒适等情感性因素，诱发着人的乡情、亲情和思乡感、归家感。见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90,61,238,184.

- [7]何福仁,甘玉贞,樊善标等.西西研究资料[M].香港:中华书局,2018.
- [8]西西,何福仁.乌托邦、敌托邦、异托邦[J].西方科幻小说与电影——西西、何福仁对话[M].香港:中华书局,2018:21.
- [9]何福仁.胡说怎么说——与西西谈她的作品及其他 2[J].素叶文学,1983,(17·18):46.
- [10]凌逾.跨媒介香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2.
- [11][12][13][14]何福仁.《我城》的一种读法[J].西西.我城[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49,252,254,250.
- [15]西西,何福仁.时间的话题[M].台北:洪范书店,1997:201.
- [18]陈智德.解体我城: 香港文学 1950-2005[M].香港:花千树出版有限公司,2009:159.
- [19]姚文放.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生态乌托邦思想[J].曾繁仁:人与自然 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292-295.
- [20][21]杜树海.西方人类学界万物有灵论研究述评[J].民族研究,2023,(5):117-134+142.
- [22][25]王诺.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61,35.
- [26]贺小力.时空的轻盈之舞——论西西《我城》的时空结构[J].名作欣赏,2013,(23):18-20.
- [27]保罗·蒂里希.政治期望[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172.
- [28]奥古斯丁.忏悔录[M].周士良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 [29][35]陈洁仪.《我城》的现代性:“未来观”与“时间共存”[J].中山人文学报,2008(26):61-76.
- [37]ANTHONY VIDLER. The Architectural Uncanny: Essays in the Modern Unhomely, Cambridge: MIT Press, 1992, p.167, 转引自 JANE M. JACOBS. Edge of Empire: Postcolonialism and the C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3.
- [38]《i-城志》编辑小组.有关《i-城志》[J].见香港艺术中心及 Kubrick 编.i-城志——我城 05 跨界创作[M].香港:香港艺术中心出版社,2005:1.
- [39]陈岸瑛.关于“乌托邦”内涵及概念演变的考证[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123-131.
- [40]陈智德.西西:香港说梦人[J].南风窗,2006,(5):82-83.

## The Emergence of the "Brave New World": A Study of Utopian Writing in My City

Chu Yingzhu<sup>1</sup>

<sup>1</sup>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My City* not only marks the emergence of Xi Xi's Hong Kong consciousness but also signifies the starting point of her utopian writing. In her works, Xi Xi constructs a "Hong Kong utopia" imbued with distinctive ideological significance, which can be understood through three interrelated dimens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city, human and nature, and human and time. This utopian vision reveals the tension 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 while simultaneously reflecting the complex socio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identity issues of Hong Kong during that period. On the one hand, her utopian writing conveys dissatisfaction with and criticism of contemporary Hong Kong society; on the other, it embodies a hopeful outlook toward future social structures and multidimensional relationships. In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ideal and the real, utopia becomes not only a mirror space for critiquing reality but also a spiritual vessel for envisioning a future community, illustrating Xi Xi's profound concern for Hong Kong's present condition and its future possibilities.

**Keywords:** Xi Xi; My City; Utopia; Hong Kong;